



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列



吴稚晖研究



WUZHIHUI YANJIU

徐超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吴稚晖研究

徐 超◎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·上海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稚晖研究 / 徐超著. — 上海: 上海大学出版社,
2017. 10

(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列)

ISBN 978-7-5671-2929-0

I. ①吴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吴稚晖(1865-1953)—
人物研究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0416 号

责任编辑 徐雁华

封面设计 倪天辰

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

吴稚晖研究

徐超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press.shu.edu.cn> 发行热线 021-66135112)

出版人 戴骏豪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mm×960mm 1/16 印张 10.75 字数 205 千
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2929-0/K · 171 定价 46.00 元

目 录 | Contents

绪 论 / 001

一、其人其事 / 001

二、相关研究 / 011

第一章 遭遇“苏报案” / 021

一、研究回顾 / 021

二、吴稚晖回沪入社 / 026

三、不安空气中的《苏报》 / 037

四、蔡元培去社离沪 / 045

五、吴稚晖离社 / 053

六、清廷拿人 / 058

七、余波 / 066

第二章 吴稚晖的“1927 年” / 070

一、前奏 / 070

二、蒋介石反共面目的暴露 / 76

三、对上海的争夺 / 079

四、群集上海 / 088

五、联合各方势力 / 093

六、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/ 099

第三章 论战科与玄

/ 102

一、研究回顾 / 102

二、科学地位受到挑战 / 106

三、争取青年学生的认同 / 110

四、玄学派的主要观点 / 116

五、吴稚晖的人生观 / 121

六、七个新信条 / 148

结 论

/ 155

参考文献

/ 157

后记

/ 167

绪 论

一、其人其事

吴稚晖(1865—1953),1865年3月出生在江苏武进雪堰桥一带,原名朥,后改名敬恒,学名吴纪灵,字稚晖。6岁时母亲病故,遂寄养无锡江尖上外祖母邹家。1891年考中举人,曾参加会试,但名落孙山。1901年留学日本,后被逐回。1902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,参与《苏报》工作,“苏报案”后留学英国,结识孙中山,并加入中国同盟会,在法国出版《新世纪报》。1924年,国民党改组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、国民政府委员等职。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逃往台湾,1953年逝世。他一生追随国民党,却以不做官为信条,不出任任何实职。

晚清时,读书做官是当然的选择。那时读书人通过熟读四书五经、写八股文章、应科举考试,期待学得文武艺、售与帝王家,这是读书用功的根本目的和人生追求。吴稚晖生活在这样的时代,当然也就与同时代的读书人有着差不多同样的经历,向往金榜题名,实现自己朝为田舍郎、暮在天子堂的人生。为此,他努力读书,参加科考,中了秀才,还考上了举人,进过书院,并向科举的终极目标——会试冲刺过,但是最终没有成功,晚清的进士名录中没有他的名字。

晚清适逢千年未有之变局,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做官的时代。当吴稚晖出生之时,列强入侵,中国近代最为惨烈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,统治阶级在战争中受到深深的震撼,其中曾国藩、李鸿章和左宗棠诸人,深感统治不可能照旧进行下去,于是按照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思

想理路学习西方,进行“自强求富”运动。到了吴稚晖的而立之年,自强求富运动已经进行了近30年,国家一度也出现了所谓的“同光中兴”的局面,国人也曾一度感到兴奋过。偏偏在这个时候,日本经过明治维新,学习西方造枪制炮,开始强大起来,并向大清帝国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。

1894年甲午一役,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错愕之余,也彻底惊醒了。他们深深感到只引进“西用”而不改变“中体”,是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的,于是高呼维新,进行变法。在甲午战争时,吴稚晖正好在北京参加会试,亲眼看到统兵将领卫汝贵因“平壤之战作战不力”“所统盛军军纪败坏”而被处斩,他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所在。吴稚晖感到即使有大炮兵船,也未必能成为强国,而知识分子除了咬文嚼字,还应有其他救国之道。当时维新思潮兴盛,1898年吴稚晖与好友廉南泉在北京南海会馆见了康有为的一面,相谈甚欢,吴也因此自称为“维新派”。康梁变法失败后,吴稚晖入京拦都御史瞿鸿禨的轿子,上书请求革新,结果不了了之。但总体来说,吴稚晖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并不出色,最多也就是维新运动的同情者。

吴稚晖亲历了维新运动,目睹了康梁被逐和六君子喋血街头。接下来,义和团大闹京津,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,亡国灭种迫在眉睫,都给吴稚晖以深深的刺激。在清末留日风气起后,吴稚晖登舟东渡,赴日留学。在日本,吴稚晖不满清政府在日本的留学政策,大闹清廷驻日使馆,被驱逐回国。这种敢于向清政府叫板的做法,令人刮目相看,从此他名声大噪。回国后又遭遇了“苏报案”,此案中最有名的就是章太炎和邹容了,但吴稚晖也是深度介入者之一。“苏报案”是吴稚晖人生的转折点,案发后吴稚晖逃到了英国,在那里,吴稚晖被工业社会深深震撼了,物质文明的重要性在吴稚晖的思想中深深扎根。吴稚晖相信物质文明重于精神文明,“他的新宇宙观新人生观,是盼望人们来到这个宇宙大剧场,便要把演唱的脚本做得好好的,用你的两只手去做工,用你的脑力去帮助两只手制造机器,发明科学,创造文明,提高智慧,增进道德,然后不枉登场一番”^①。

在海外,吴稚晖参加了同盟会,最终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,不过在接

^① 曹聚仁:《我与我的世界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,第305页。

受同盟会的主张之前,吴稚晖已经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,成为中国第一批无政府主义者。吴稚晖还与张静江、李石曾等人,在巴黎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《新世纪》,刊物上除了宣传无政府主义,还刊登了大量革命文章。

清政府灭亡,北洋掌权,作为国民党元老,吴稚晖再次被边缘化。后来,吴稚晖成为“蒋家客卿”。蒋介石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,但是曲解三民主义,推行专制统治。面对这种情况,如何调和其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,吴稚晖表示:“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,但把吴稚晖化了灰,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。”

吴稚晖于25岁进行江阴南菁书院学习,27岁中举人,深谙传统经史子集等学问,基础深厚,了解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。37岁到日本,算是第一次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,然后39岁亡命英国,直接沐浴西方文明。在欧洲生活10年有余,吴稚晖感受到了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,希望能改造贫穷落后的中国,为此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。

19、20世纪之交,中国新知识分子开始和西方思潮发生接触,其关于西方知识的获得,多是从日本间接得来。但20世纪初,已有少数知识分子身临欧美,亲身接触了西方文明,吴稚晖是代表者之一。吴稚晖到达英国,正值欧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之时,受到科学、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所难免。与此同时,又正是西方无政府主义流行之际,克鲁泡特金的《互助论》刚刚出版。吴稚晖到达欧洲后即接受了无政府主义,其创办的《新世纪》周刊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宣传无政府主义。20世纪初,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认知主要来自东京和巴黎。在日本东京的刘师培、何震夫妇等间接吸收日本学者的译述,发刊《天义报》倡导无政府主义;在巴黎以吴稚晖等,则直接吸取欧洲无政府主义学者思想精华,通过《新世纪》进行宣传倡导。《新世纪》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学者,如蒲鲁东、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等都有相当篇幅的介绍。

吴稚晖对“无政府”三字情有独钟,认为它是“世界上最吉祥的名词”,他认为所谓的“无皇帝好过日子”,正是确确凿凿的无政府的别名。当然这里的“无皇帝”并不是回到原始社会过茹毛饮血的日子,相反是进化到一个较

为美好的阶段。吴稚晖曾给无政府下过一个定义：“无政府若有‘道德’，而无‘法律’，唯‘各尽所能’，而不可谓之‘义务’；唯‘各取所需’，而不可谓之‘权利’。人人自范于‘真理公道’，而无‘治人与被治者’，此之谓无政府。”^①无政府的最终理想，用三个字形容最为妥帖，即“新世纪”，这个新世纪应该是：“众生一切平等，自由而不放任，无法律以束缚钳制之，而所行所为，皆不悖乎至理。为善纯乎自然，而非出于强迫也。唯然，故无所谓武备，更无所谓政府，无所谓种界，更所谓国家。其卒也，并无所谓人我界。含哺而熙，鼓腹而游。无争无尤，无怨无竞。怡怡然四海皆春，熙熙然大同境象也。”^②

为了达到这样一个“新世纪”，吴稚晖认为应该采用两种方法：一是靠书报学说以化民心，亦即采取教育的方式，无政府主义者视教育为进化的主要手段；二是采取强硬手段，以诛除人道之贼，也就是通过革命的手段，把革命视为教育的辅助手段，革命与教育可以是相通的。最终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成了为蒋氏独裁辩护的工具。

在欧洲，除无政府主义思潮，科学思潮对吴稚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18、19世纪西方科学发展迅速，而同一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迟滞，特别是中西方正面接触以后，对比明显。西学东渐后，西方文明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，科学主义也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的重要思潮，吴稚晖更是科学万能的代表。吴稚晖曾在主办的《新世纪》上解释科学的意义：“所贵乎科学者，阐明奇奥精确之理，以显妙能敏捷之用，以之研究，则增人智识，发达思想；以之实行，则省时省力，奏奇妙功。故科学未发明以前，世界所经营，皆愚笨简单；科学既发明之后，万象更新，十九世纪与本世纪，实科学发展之时代也。”^③对于西方科学，吴稚晖指出“此乃人类积时代为开明，适至此，人类心思与才力，适足取科学而发明之，于是世界有科学。起点在西与在东，不过发脚之先后”^④。这里吴稚晖明确指出，科学对于人类是通用的，科学绝非西方独有的，因此采用科学也就不能与“西化”等同观之。

① 吴稚晖：《谈无政府主义之闲天》，《新世纪》1908年5月第4号。

② 吴稚晖：《与友人书论新世纪》，《吴稚晖全集》（第6卷）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3页。

③ 民：《金钱》，《新世纪》1907年7月第3—4号。

④ 吴稚晖：《书〈神州日报〉〈东学西渐〉篇后》，《新世纪》1909年6月第101—103号。

吴稚晖对科学的推崇,据其自己说:“我们崇拜科学:一是因为道理上要讲,常识是模糊影响的,科学是精细确当的。二是因为我们不肯四脚戴毛的,要用‘人工’以抗‘天行’,科学是人工的根本法。三要完成一切理想的道德,止有科学万能;若靠天吃饭,任天而行,与天为游,说得好像是天的孝子,其实都是依赖穷天爷爷的不肖子。拆穿了说,叫做懒得做人。人者,能以人工补天行,使精神一切理想的道德,无不可由之而达到,又达到者也。”^①科学不仅能改变物质的生存环境,而且对精神世界,诸如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,都有深切的影响,吴稚晖指出:“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。文艺复兴以后,它的火焰在欧土忽炽,近百年来,更是火星迸裂,光明四射。一切学术,十九都受它的洗礼。即如奥远的哲学,言感情的美学,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,琐碎纠纷的社会,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,手携手地向前走着。人们的思想,终容易疏忽,容易笼统。受着科学的训练,对于环境的一切,都有秩序地去观察整理,对于宇宙,也更有明确的了解,因此就能建设出适当的人生观来。”^②

科学能带来物质文明,相对于精神文明,吴稚晖更看重物质文明,他表示自己“唯认物质文明,为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发挥,则坚信无疑。幸福者,果何物乎?幕吾以天,席吾以地,缠藤叶于吾身,坐山石之上,歌声出金石,固何歉乎?精神完固之我,而不认为有一种高尚之幸福。但此种幸福,皆在物质备具,充养吾之精神,已使演进而有余。而后偶任吾个体之返本自适,遂有若天地甚宽,其乐反未央耳”^③。在吴稚晖看来,具备物质才能使个人返本自适,达到幸福的境地,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好,享受精神上的无限快乐,这才是精神文明的应用之义,只有这样才是道德的。吴稚晖之所以主张发展物质文明,最终是为了发展精神文明,滋养精神,其用意不言而喻!

提倡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同时,对于宗教和传统文化,吴稚晖也有自己的看法。吴稚晖认为宗教与自己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调和的,他认为宗

① 吴稚晖:《物质文明与科学》,梁冰弦编:《吴稚晖学术论著续编》,上海:江湾合作出版社1927年版,第89页。

② 吴稚晖:《科学周报发刊语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第3卷),北京: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,第310页。

③ 吴稚晖:《青年与工具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第3卷),北京: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,第405页。

教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。按照吴稚晖的看法,宗教是反科学的,是一种“迷信”,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,而无政府主义是依据道德破除人之迷信。换句话说,无政府主义是人与人相互的产物,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良道德相维系,良道德是进化的公理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应该由科学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世界,宗教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,吴稚晖主张用科学代替宗教。

倡导物质文明的吴稚晖,擎起科学万能的大旗,自然对传统文化有一番自己的认识。吴稚晖是受传统文化浸润过的人物,思想几经变迁,社会阅历也相当丰富,在这样的背景下,他觉得中国社会思想有彻底改造的必要。对于“国故”,吴稚晖很不以为然,在科玄论战中更有把线装书抛入茅厕的激烈主张。当然到了晚年,吴稚晖曾有过一些小的改正,他说:“我虽随同打过‘孔家店’,现在正正经经研究大道理,还是请这位老黄忠(孔子)出来。我们打‘孔家店’,也止是最微末小节,就是与上大夫言,何以一副面孔,忽然与下大夫言,又换一副面孔,表情太分明。又既然饭蔬饮水,曲肱而枕,乐在其中,何以又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,狐貉之厚以居?……诸如此类小节,都被小孩子戏弄过大圣人。然而止是如日月之食,无损于其明。”^①

吴稚晖批判传统文化,指责孔圣人“装面孔,凑架子”,是基于科学进化论的观点。这与其早年“忠君爱国”“非圣无法”的言论相较,差别很大。对于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进行批判,是吴稚晖为了提倡科学的必然选择,只有批判一般人所醉心的“精神文明”,其科学物质文明才有立脚的基石。胡适曾把吴稚晖称为近代反理学的四大思想家之一。

在近代,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的强势冲击,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: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,辅以诸国富强之术。”后来,这一思想被概括为“中体西用”,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。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,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,天下滔滔,泥古不化的士人,包括吴稚晖也高唱着“圣人之道”“忠君爱国”,在那样的时代,欲破启锢闭,引入若干西方文明,除了“中体西用”,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。如无“中体”作为前提,“西用”无所凭借,在中国无由以立。因此,“中体西用”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完

① 吴稚晖:《答毕修书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第1卷),北京: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,第234页。

全不了解的世界,看到了那个世界的一部分,并把其引入中国,成为中西文明交冲汇融的一种特定形式。但随着形势的发展,“中体”越来越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一种障碍。

吴稚晖到了欧洲以后,对于所谓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当时国人看到新事物,往往有一种“从古所有”的态度,吴稚晖也极为厌恶这种态度。他持科学进化论的观点,深信古人断不及今人,今必胜古。因此,吴稚晖对“国故”没有好感,经常把“国故”比作“古董”,既然是“古董”就应该束之高阁,否则这些“国故”就可能与小老婆、鸦片等相依为命来祸害中国,因此他主张摒弃孔孟、老墨之学,而极力发展科学物质文明。

吴稚晖主张“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”,对于西方的洋哲理、洋文学也多有反感,他说:“中国数千年偏重了文的哲想,自无可讳言。最近数百年又被圣功王道的八股思想统一了一阵,至今余毒未清。因此改了洋文学,谈起洋哲理,插入洋圣功王道的法政学,加入洋经世文编的商科理财,结以洋、周、秦诸子的各种洋九流三教(什么主义,什么主义),遂成了洋八股的伟观。所以若再听凭他百千大学开设了,使他休明出来。结果是:有饭吃,便把官僚、政客、土豪、游民,做他们的尾闾去排泄罢了。那种博学鸿词科式的泰戈尔,也必定盛极一时,过他们高尚亡国奴的生活,因此欲矫枉而过其正,非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出来,不足以淡此瘴气(谓洋八股)。”^①

吴稚晖不仅在引入西方科学进化理论上功不可没,同时是中国国语统一运动的开先河者之一,也是最早提倡拼音文字的人。统一国音、推广国语运动是吴稚晖毕生所致力的基本工作。吴稚晖在清末江阴南菁书院就读时,就首创了一套“豆牙字母”,以拼音念字,让不识字的亲友使用,用以通信。他在巴黎主编《新世纪》周刊时,发表多篇文章,如《万国新语》《记万国新语会》《新语问题之杂答》《书驳中国用万国语新语说后》和《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》等,专门讨论国语问题。吴稚晖提倡编刊国音字典,主张小学课本和通俗书报都在方块字边附加注音符号。国语运动实际上就是“语同音”的运动,吴稚晖认为这一运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,把其作为社会教

① 吴稚晖:《科学周报编辑话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第1卷),北京: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,第387页。

育运动的基本工作。

吴稚晖把汉字比作皮鞋,拼音比作草鞋,皮鞋有皮鞋的价值,草鞋有草鞋的价值,一般而言皮鞋的价值高,草鞋的价值低。但是有些时候,价值的高低也不能一概而论,比如在道路泥泞的地方,草鞋的价值就要比皮鞋的价值高了。在中国道路多泥泞,草鞋的价值反而高一些,同理,在文化素质偏低的国情下,拼音文字就比方块汉字更为重要,也更有价值。吴稚晖认为中国内忧外患严重,普及初等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法子,而拼音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利器,所以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,“研究注音文字的主要目的,是为着中国十分之九的目不识字的国民,增加知识,灌输教育,这注音字母,实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”。

1912年,吴稚晖从欧洲返国,在南京临时政府里成为孙中山的幕僚,孙中山也认为统一语言是集中国民意志的重要手段,就把统一国语的工作交给吴稚晖筹划。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下,教育部设置“语音统一会筹备处”,由吴稚晖担任主持。1913年筹备处召集了一次语音统一会议,由吴稚晖任议长,王照任副议长。参加会议的40多人,均是文字语言学专家,会议决议通过了一套平实可行的注音字母,审定常用的读音,奠定国语统一的基础。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,吴稚晖也离开了教育部,但他并没有放弃语音统一的工作。1917年,吴稚晖编订了一部《国音字典》,收一万三千余字,在1920年12月由教育部颁行全国,一直沿用到1932年,吴稚晖对字典再次修订,并更名为《国音常用字汇》。

1919年,教育部成立了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,集合文字语言专家研究注音,吴稚晖担任副会长,主持工作。1924年,吴稚晖还在上海创立国语师范学校,“专为已经学习国语,再求深造,养成专门国语人才而设高等科”。花甲之年的吴稚晖还亲自教授“国语概论”,发表《二百兆平民大问题》,呼吁以国语与注音字母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。同时吴稚晖还组织该校学生上街游行宣传,他手举校旗领队而行,向社会推广国语,希望由点及面逐渐展开,以实现“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”之理想。

蒋介石取得政权后,吴稚晖担任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”主席,亲手制定各种国语法令,如《各省市推行注音符号办法》《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》和

《姓名译音办法》等,然后由政府颁布实行。1935年教育部把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”改为“国语推行委员会”,吴稚晖仍然是主任委员。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国语运动与吴稚晖是密不可分的,他是这一运动的提倡者、领导者和工作者,但很难说吴稚晖是一个实行者,毕竟他有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。那时的国语统一运动,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推广普通话运动,而今天的汉语拼音与吴稚晖主张的注音字母,也有一些渊源。

吴稚晖在为学与从政之间进退自如,以“民国大佬”的身份影响政局而又不任实职,可谓一个异数。就政治实职而言,的确无足称道。吴稚晖于1927年辞总政治部主任而不就;1928年被推为监察院长而不就;1943年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,国民党中央推吴稚晖为主席,而吴避之唯恐不及。吴稚晖认为“官是一定不必做的,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。不问国事,那是吾民之大劣点;一问国事,便同做官连起来,又是吾民之一大谬点。必要倡出一种做官是万不得已,只去吃苦的风气来才好”。

作为政治人物的吴稚晖,一生所保留的头衔有“中央监察委员”“中央评议委员”“国民大会代表”“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”“中央研究院院士”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”“总统府资政”等,这些或是国民党的职务,或是民意代表,或与备供咨询、学术研究相关,虽然都不是实际官职,但是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、孙中山的朋友、蒋介石的师爷、蒋经国的老师,多重身份让吴稚晖在民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

吴稚晖经历丰富,从清廷举人到革命元老,再从革命元老到“蒋家客卿”,近代社会各种急剧的变动,使其成了近代社会变迁中一个极好的“活标本”。作为“蒋家客卿”,吴稚晖对蒋介石之忠是声名卓著的。作为国民党元老,与张静江、蔡元培等比起来,吴稚晖可谓全无主见,甚至不顾他人耻笑,一味紧跟蒋介石。蒋介石也投桃报李,对吴稚晖尊重有加。蒋介石需要帮忙时,吴稚晖会绞尽脑汁献计献策;蒋介石遇到难关时,吴稚晖会尽其所能做其他人想做又不好做、不敢做的事。

吴稚晖作为清廷举人,其传统文化的功底是相当深厚的,与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,吴稚晖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普通科举之路。他参加科举,后来被维新运动所感召,放弃科举,毅然以37岁的“高龄”踏上东赴日本寻求救

国救民的道路。吴稚晖早年的知识积淀,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,对于后期思想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。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,吴稚晖个性鲜明,涉猎广泛,脚踏政治、文化两条船,复杂而独特。通过对吴稚晖主要思想及其思想变化的考察,不仅可以提供全面、公正地审视和评价他的机会,而且可以通过这个个体,管中窥豹般地去透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群体,解读这个群体如何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。剥离脸谱化的叙事,还原吴稚晖所处的真实历史场景,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。

清末危局,民初惨象,身处此大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触动,特别是身历抗日战争,吴稚晖对民族问题的关切自始至终、至死不渝,深明民族大义,特别是面对汪精卫投降日寇的行径,吴稚晖曾痛骂:“卿本佳人,奈何做贼。”在汪精卫一生中,其也曾是反清义士,写下过“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的壮丽诗篇,汪精卫因此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仰慕的对象,他的革命气概也激励了许多青年,所以吴稚晖说他“卿本佳人”;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昔日的反清义士,堕落成可耻的汉奸卖国贼,所以吴稚晖说他“奈何做贼”。短短八个字,可谓一针见血,一时传颂,令人击节称赞。据说汪精卫见后,三日吃不下饭。抗战期间,吴稚晖矢志不移,力主对日抵抗,并身体力行,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。

吴稚晖是一个生长在中国新旧社会过渡阶段的知识分子,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,也具有西方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,爱国忧民,勇于接受新知。虽曾是举人,具有深沉的国学积淀,但他却不为传统思想所桎梏,在西方科学文明中纵横驰骋。他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,把握了西方文明的精髓,即科学进化,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先驱。

吴稚晖饱受传统国学熏陶,又得近代西学训练,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名,后又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。情怀奇崛,为人怪诞,惯好骂人骂世,妙谈奇论不绝于口。作为国民党大佬,蒋介石毕生待之以师礼,他亦以助蒋为平生之职志。章太炎说吴稚晖是“外作疏狂,内贪名势”;胡适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以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;蒋梦麟称其为中国学术界一

颗光芒四射的彗星；曹聚仁评价吴稚晖是张良式的人物，集豪杰与名士于一身。

吴稚晖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大家，他生活平实清淡，欲望十分淡泊，但思想高超，常常寓大义于微言，在看似轻松调谑的方式中阐述深刻的哲理。在政治上，居于国民党的“师保”地位，长期被认为是“蒋家客卿”，对蒋氏父子有很强的影响力。台湾当局在蒋介石去世后，为其立了铜像，在蒋介石铜像旁边唯一陪祀的就是吴稚晖的铜像，可见吴蒋关系之深。

由于坚持无政府主义信仰，吴稚晖拒绝一切实授官职，对于民国政治若即若离，但关键时刻总有吴稚晖的身影，决疑解纷，手段高超灵活，影响深巨。吴稚晖可谓是从传统走向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。1962年6月，吴稚晖被授予“世界文化学术伟人”的荣誉称号，同年10月22日，联合国秘书处通知全球各会员国，对吴稚晖在文化学术及科学方面的贡献应表示适当的纪念。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，如何认识与评价吴稚晖仍是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二、相关研究

1. 研究概述

大陆长期将吴稚晖定位为反动分子、投机革命的“两面派”，缺少对其思想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，对其文化学术体系更较少涉及。大陆对吴稚晖的个案研究相对而言并不丰富，系统介绍吴稚晖的生平专著并不多见，主要有路小可著的《民国大老：吴稚晖》^①，罗平汉著的《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》^②和《布衣大佬吴稚晖》^③，徐霞梅编著的《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》^④，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编的《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——吴稚晖》^⑤等。

① 路小可：《民国大老：吴稚晖》，兰州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② 罗平汉：《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。

③ 罗平汉：《布衣大佬吴稚晖》，北京：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。

④ 徐霞梅：《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》，无锡历史文献馆、无锡历史学会编印。

⑤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编：《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——吴稚晖》，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。

《民国大老：吴稚晖》一书参考了海内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，对吴稚晖近90年人生之路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，对吴稚晖在“苏报案”中的表现很不在意，认为吴稚晖“完全与学生站在一起，与章炳麟等人对抗……充当了鼓吹、制造革命阵营分裂的急先锋”。

《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》和《布衣大佬吴稚晖》以时间为序描绘了吴稚晖复杂传奇的一生。

《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》按年编排，大致勾勒了吴稚晖的生平和业绩，主要依据吴稚晖诗词、文章、书信及传记资料分年辑成，收录了吴稚晖所撰写的百多篇文章。从中可以了解农家少年吴稚晖，一个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科举“陋儒”，是如何转变为温和的维新派，继而成为反清革命志士，最后一生追随国民党。

《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名人——吴稚晖》一书主要收录了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名誉会长陈毓敏的研究成果，还有研究会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稿，在附录里还收录了吴稚晖的部分作品以及报刊评说吴稚晖的文章。

在大陆，除了上述专著，介绍吴稚晖生平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《“老师爷”吴稚晖》^①和《“疯狗”师爷——吴稚晖》^②。

在台湾地区，特别是两蒋时代，吴稚晖有着极高的地位，关于吴稚晖的系统性专著主要有《吴稚晖先生传记》^③《吴稚晖先生大传》^④《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》^⑤《吴敬恒述传》^⑥《永远与自然同在——吴稚晖传》^⑦《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》^⑧《吴稚晖与国语运动》^⑨等。

《吴稚晖先生传记》是为了纪念吴稚晖诞辰百年而作的，作者记述了吴稚晖艰苦磨炼的历程，阐述了其在统一国音、提倡科学、中西方学术交流等

① 左玉河：《“老师爷”吴稚晖》，载《同舟共进》2009年第8期。

② 左玉河：《“疯狗”师爷——吴稚晖》，《民国政坛上的八大奇人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。

③ 张文伯：《吴稚晖先生传记》，台北：文星书店1964年版，台北：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增订版。

④ 陈洪、陈凌海编著：《吴稚晖先生大传》，台北：1964年版。

⑤ 李文能：《吴敬恒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》，台北：中正书局1977年版。

⑥ 汤承业：《吴敬恒述传》，台北：世界书局1987年版。

⑦ 赵淑敏：《永远与自然同在——吴稚晖传》，台北：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⑧ 杨恺龄编著、王云五主编：《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。

⑨ 詹玮：《吴稚晖与国语运动》，台北：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。